

中国现代文学读本

中国

现代文学

读本

主编 / 朱梁卿
副主编 / 蔡少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

现代文学

读本

第二版

高等学校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读本

朱梁卿 主 编
蔡少薇 副主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

(京)新登字 18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读本/朱梁卿编著.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1998. 8

ISBN 7-81000-850-1

I. 中… II. 朱…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1237 号

© 1998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现代文学读本

朱梁卿 编著

责任编辑: 李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惠新东街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北京北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7.25 印张 448 千字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00-850-1/G · 178

印数: 0001-5000 册

定价: 22.50 元

目 录

第一编 “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的勃兴	(1)
鲁 迅 伤逝	(24)
(附) 鲁 迅 娜拉走后怎样	(43)
冰 心 超人	(50)
郁达夫 沉沦	(58)
许地山 缀网劳蛛	(91)
叶圣陶 潘先生在难中	(110)
鲁 彦 菊英的出嫁	(128)
胡 适 人力车夫	(138)
沈尹默 月夜	(141)
郭沫若 凤凰涅槃	(143)
闻一多 死水	(156)
徐志摩 再别康桥	(159)
(附) 徐志摩 我所知道的康桥	(163)
李金发 弃妇	(172)
冯 至 蛇	(175)
周作人 北京的茶食	(178)
朱自清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81)
(附) 俞平伯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90)

梁遇春	猫狗	(196)
-----	----	-------

第二编 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与进步文学 (200)

茅盾	子夜(节选)	(221)
丁玲	莎菲女士的日记	(245)
艾芜	山峡中	(279)
施蛰存	春阳	(296)
戴望舒	雨巷	(305)
殷夫	血字	(309)
何其芳	预言	(312)
卞之琳	断章	(315)
臧克家	老马	(317)
林语堂	秋天的况味	(319)
巴金	做大哥的人	(322)
沈从文	沅陵的人	(330)
曹禺	日出(节选)	(343)
夏衍	上海屋檐下(节选)	(374)

第三编 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文学 (396)

老舍	四世同堂(节选)	(421)
沙汀	在其香居茶馆里	(430)
孙犁	芦花荡	(446)
赵树理	小二黑结婚	(453)
张爱玲	倾城之恋	(468)
艾青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506)
(附)	艾青 我爱这土地	(512)
田间	给战斗者(节选)	(513)
梁实秋	雅舍	(520)

丰子恺	怀李叔同先生.....	(524)
钱钟书	说笑.....	(532)
王实味	野百合花.....	(536)
后 记		(545)

第一编 “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的勃兴

(1917—1927)

一、“五四”文学革命

中国现代文学(新文学)肇始于1917年发难的文学革命。从此,中国现代文学替代了古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揭开了全新的一页。

“五四”文学革命是一次伟大的变革,但其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看,鸦片战争以后近代文学中一些民主主义、改良主义因素,从内容到形式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的萌生作了必要的准备。另外,西方文学及其思潮的开始传入我国,也对传统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而更为重要的是,文学革命的发生离不开“五四”伟大变革的时代,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皇朝,但并未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恢复帝制,荼毒生灵,中国依然处于内忧外患交相煎逼的痛苦境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认识到旧文化、旧思想仍然严重地阻碍着民族意识的觉醒,痛感到思想革命的重要性。他们奔走呼号,致力于新的思想启蒙工作,以唤醒民众,挽救民族的危亡。这种广泛的思想启蒙运动后来就发展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新文化运动以科

学、民主为伟大旗帜，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并首先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孔教，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浪潮。对封建思想道德的批判，很自然发展到对作为旧思想旧道德工具的封建旧文学的批判。于是，一场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文学革命运动爆发了。

最早提出文学革命主张的是胡适和陈独秀。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中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即：“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语俗字”。虽说该文着眼点在于形式问题，涉及内容的不多，且态度也较温和，但胡适从文学进化的角度，首先提出以白话文为中国文学的正宗，主张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这实际上起到了为文学革命“发难”的作用，因而陈独秀称赞胡适为“首举义旗的急先锋”。1917年2月，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紧接着在《新青年》上发表。该文论点更为鲜明，态度更为坚决，明确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文章从总体上对封建旧文学进行了讨伐，指出“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而其形式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只是装饰而已。提出要建立一种能表现“宇宙、社会、人生”的“抒情写事”的新文学。并表示“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作文学革命的“前驱”。

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提出后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等一批有识之士的支持和响应。并以《新青年》编辑部成员为核心，形成了新文学统一战线，共同向封建旧文学宣战。嗣后，新文学阵线又就如何建设新文学问题展开了讨论。先后发表的主要论文有：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李大钊的

《什么是新文学》等。

文学革命提出后的最初一年多时间里,主要还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尚无真正有力的新文学作品出现。

真正显示文学革命实绩的是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诗歌以及其他作家的一批新文学作品的诞生。1918年5月,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成为新文学的开山作。接着,《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杰作相继问世,矛头直指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及其伦理道德,形象地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形式上也显示了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特征。郭沫若几乎同时在“学灯”上发表了《凤凰涅槃》、《匪徒颂》等系列诗篇,破旧迎新,体现了狂飚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开一代诗风。其他如叶绍钧的小说《这也是一个人》,刘半农的诗歌《相隔一层纸》等,也都体现了反封建、民主主义的思想主题。这些新文学作品相当成熟,起点很高,从内容到形式完全不同于旧文学,显示了强大的思想艺术生命力。由此,新文学的主流地位,从理论到实践得到了巩固。

与此同时,白话文也逐步而又迅速地得到了推广。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率先全部改用白话刊出,全国各种报刊杂志竞相效尤,用白话写作的小说、诗歌、散文、论文甚至译作大量涌现。白话文实际上已在整个社会和文化领域取代了文言文的正宗地位。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也不得不承认白话为“国语”,通令全国各类学校采用。

外国文学作品的大量译介和外国文艺思潮的纷至沓来,也是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新青年》为首的众多期刊杂志,大量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甚至出某一外国文学家的专号。这种情况,打破了几千年来的文化专制主义,促进了思想大解放,对新文学作品的创作甚至文学流派的形成,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五四”文学革命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而彻底的文学革新运动。它使中国文学从封建思想的藩篱和文言的桎梏下解放

出来,走上现代化、大众化的道路,并与世界文学相沟通,从而揭开了现代文学光辉的第一页,把中国文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新文学社团的蜂起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一大批新文学作家成长起来了。他们以不同的创作倾向和艺术方法,各自结集为不同的文学社团,并竞办各种文艺刊物。据统计,1921年至1923年,全国出现的文学社团有40余个,出版文学刊物52种。而到1925年,文学社团和期刊已增到100多。这是文学革命深入发展的一种表现,也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之一。在众多的新文学社团中,成立最早、影响最大、流派发展上有代表性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发起人为郑振铎、沈雁冰、周作人、叶绍钧、王统照、孙伏园、许地山、耿济之、郭绍虞等12人。后来加入的有朱自清、谢冰心、俞平伯、老舍等,共有会员百余人。主办刊物有《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文研会的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①其文学主张是“为人生而艺术”,被称为“为人生派”,它在《发起宣言》中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创作也多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出现不少所谓“问题小说”。并继承《新青年》传统,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方面,着重译介俄国、法国及北欧、东欧的现实主义名著。

创造社1921年7月成立于日本东京。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寿昌、穆木天等,他们当时都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等十余种刊物。初期他们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被称为“为艺术派”。他们认为文

^① 《文学研究会简章》。

学必须忠实地表现“内心的要求”，讲求文学的“全”与“美”。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十分强调文学“对于时代的使命”，主张对旧社会“要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① 创造社基本的艺术倾向是浪漫主义，他们译介的大多也是外国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在创作、翻译、文艺批评等问题上有过一些争论，其中不无门户之见，但总的来看，这种相互批评与砥砺，客观上有利于不同艺术流派的竞争与发展。而在反对封建复古派和鸳鸯蝴蝶派方面，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除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外，还有一些文学社团各有特点和贡献。其中语丝社、未名社的创作倾向接近于文学研究会；而弥洒社、沉钟社则受创造社的影响较大。

鲁迅支持并参加的语丝社，1924年11月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还有周作人、钱玄同、孙伏园等。办有《语丝》周刊，多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文、散文，从事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形成一种风格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

未名社也是在鲁迅支持下1925年秋成立于北京。成员多为青年，有韦素园、台静农、曹靖华、李霁野、韦丛芜。办有《莽原》、《未名》期刊，主要从事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和东欧文学。

沉钟社1925年10月成立于北京。办有《沉钟》期刊。他们“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将真和美唱给寂寞的人们。”^② 他们致力于外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介绍；创作有陈炜谟、陈翔鹤、林如稷的小说，冯至的诗歌，朴实而带有感伤的浪漫主义色彩。鲁迅曾称赞他们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

湖畔诗社1922年成立于杭州，成员有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

①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创造周报》第2号，1923年5月。

②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汪静之，他们以写作爱情诗著称。

此外，还有新月社，1923年成立于北京。办有《晨报副刊·诗镌》等刊物。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胡适、陈源等，受西方唯美主义影响较深，创作倾向复杂而影响较大，是新格律诗的倡导者。

三、对封建复古派的斗争

文学革命的提出和深入发展，自然要遭到守旧派人物的咒骂和抵抗，从1919年至1925年就已经跟封建复古派经过三个回合的斗争。

1919年初开始，以林纾、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首先向新文学发起了反扑。刘师培等创办《国故》月刊，以所谓“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化。林纾更以“拼我残年极力卫道”的姿态，接连写了《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对白话文大加挞伐，认为白话文只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不值一哂”；攻击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把孔孟之道和文言文视为“国粹”。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鹤卿）在答覆林纾的公开信中宣称“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反驳守旧派的攻击，给文学革命以极大支持。林纾还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妖梦》，影射诋毁新文学倡导者、支持者，希望握有实权的军阀势力“伟丈夫”出来干预镇压。为此，李大钊写了《新旧思潮之激战》，揭露林纾之流的阴谋，鲁迅在《随感录》的杂文中也讽刺抨击“国粹家”，《新青年》全文转载了《荆生》，并刊文逐字加以批驳。在新文化阵营的有力打击下，林纾只能哀叹：“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实际上宣告了失败。

第二个回合是与“学衡派”的斗争。

1922年1月，南京东南大学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创办了《学衡》杂志。他们都曾留学英美，是一批“穿西装的复古派”，是标准的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相结合的代表。《学衡》自称以“昌明国

粹，融化新知”为宗旨，正体现了这一特点。他们发表的主要文章有：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吴宓的《论新文化运动》和胡先骕的《中国文学改良论》等。他们摆出一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架势，攻击马克思主义，污蔑新文化运动是所谓“数典忘祖”；为封建文学辩护，反对白话。对此，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沈泽民等著文批驳，指出其反动实质，号召进步思想界联合起来与之斗争。鲁迅写的《估“学衡”》，更揭出他们所谓“学贯中西”的把戏，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几个连旧文字也做不通的“假古董”。鲁迅尖锐地指出：“诸公抨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新文化营垒的其他人也纷纷撰文反击，“学衡派”无法招架，只能偃旗息鼓了。

第三个回合是对“甲寅派”的斗争。

1925年7月，章士钊的《甲寅》复刊（1914年创刊）。封面上印有黄斑老虎，并声称“文字须求雅驯，白话恕不刊布。”章士钊当时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却主张尊孔读经，攻击新文化运动，重弹封建文人反对白话文的老调。《甲寅》周刊上还发表了一些文章，攻击爱国学生运动，为军阀政府帮腔。章士钊实际上成为新文化运动发展道路上的一只“拦路虎”，由于章当时是掌权人物，得到北洋军阀的支持，斗争实际上又超出了文化战线的范畴，因而这场斗争显得更为艰巨复杂。新文学战线几乎动员了全部力量，全面迎击，撰写了许多批驳文章，如郁达夫的《咒〈甲寅〉十四号〈评新文学运动〉》、成仿吾的《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健功的《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等，鲁迅《华盖集》中的不少文章都是跟“甲寅派”斗争的记录，其中《十四年的读经》、《答KS君》更是批驳章士钊谬论的名文。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倒台才告结束。

经过这几次较量，封建复古派彻底惨败，显示了新文学和白话文

的生命力。此后虽不时有某些复古的沉滓泛起，但毕竟不成气候了。

在批判复古派的同时，新文学阵营还不断地同鸳鸯蝴蝶派展开斗争。鸳鸯蝴蝶派文学滋生於“十里洋场”的上海，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产物，是封建文化和买办文化的混合体。作者是没落的封建遗老遗少和洋场才子。他们主张“游戏人生”，追求趣味主义。出版了《礼拜六》（又称“礼拜六派”）、《红玫瑰》、《紫罗兰》等杂志，以才子佳人、鸳鸯蝴蝶的言情小说为主，另有黑幕小说、武侠侦探小说，投合小市民阅读趣味。这类小说风行于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间，文学革命兴起后地盘日益缩小，而在复古声浪中又纷纷抛头露面，与新文学争奇斗艳。一度中断的《礼拜六》周刊于1921年3月复刊。《玉梨魂》、《兰娘哀史》、《情网蛛丝》等小说重复风行，对人们起着麻醉和迷惑的作用。在对鸳鸯蝴蝶派的斗争中，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写了许多文章予以批驳，《文学旬刊》成了反对鸳鸯蝴蝶派的主要阵地。沈雁冰写了《自然主义和中国现代小说》，郑振铎写了《血和泪的文学》，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不是‘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冷血的产品。”鲁迅和创造社成员也纷纷著文批判，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和作品逐步减少，到30年代以后逐渐消亡。

四、新文学的勃兴

文学革命促进了思想的空前大解放，表现在创作上不但新文学作品应运而生，而且在这“五四”文学革命的最初十年里，名家辈出，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争奇斗艳，新文学领域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1. 小说

(1) 现代小说之父——鲁迅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将，鲁迅以其出色的小说创作，为新文学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1918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它以奇特的视角和夸张的手法，透过一个“狂人”的狂态狂言，尖锐而富于象征性地指出中国全部旧历史和整个旧社会的“吃人”本质，以及这种“吃人”制度所具有的凶残和虚伪的双重性。次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药》，革命者夏瑜的鲜血染红的馒头，却成了华小栓治痨病的药（而且毫无效果）。这篇小说巧妙地采取了双重情节组合的结构方式，把华小栓愚昧而可悲的死，与夏瑜壮烈而寂寞的死交织在一起，从而透视出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资产阶级革命派严重脱离社会下层的广大民众。1921年底开始在《晨报副刊》连载的小说《阿Q正传》，无疑是鲁迅对辛亥革命作批判性历史总结的最杰出的作品。农民解放的问题——不能不革命的苦难的奴隶地位，和缺乏起码革命觉悟的奴性思想之间的矛盾——辛亥革命并没有真正解决，农民的出路何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恰恰触及了中国革命的根本所在。《阿Q正传》同时也是一部解剖“国民性”，塑造典型人物的经典之作。阿Q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精神胜利法”：在瞬息之间把现实中的弱者地位荒谬地化为幻想中的强者地位，以此来安慰自己，求得暂时的心理平衡；而这实际上概括了中国人甚至整个人类社会一种带有巨大普遍性的心理结构。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功典型，阿Q不仅是“中国人中的‘每一个’（everyman）”，而且“也是全世界人中的‘每一个’”。^①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的一系列小说显示，鲁迅对旧中国历史和现实以及国民性的洞察和批判的深度，无人可以企及。

鲁迅一生最关注的是农民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第一篇写农民的杰作《风波》曾使陈独秀“五体投地的佩服”。^②小说以江南水乡一

① 威廉·A·莱尔：《Lu Hsun's Vision of Reality》。

② 陈独秀：《致周作人（1920年8月22日）》。

场“剪辫子”风波，与北京的张勋复辟事件遥相呼应，写出了中国农民依然苦难的命运和依然麻木的灵魂。《故乡》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小说，它的抒情笔调和诗化风格，流露出了较多的私人情绪（这在鲁迅作品中是罕见的）。小说运用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把意气风发的少年闰土和饱尝艰辛的中年闰土这两组画面剪辑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惊心动魄的效果：通过一连串对比、呼应和暗示，显示这位勤劳农民的悲剧命运和他灵魂中令人震悚的变化——多子、饥荒、苛捐、兵、匪、官绅，把闰土变成一个木偶人。在《祝福》中，鲁迅把目光投向了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如果说，祥林嫂受苦难、受宰割、受歧视、受唾弃的悲惨一生，代表了千百万处于生活最底层的劳动妇女的命运；那么，鲁镇恰是以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为四大支柱的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缩影。鲁迅的一系列农民题材小说，写出了一部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史。

鲁迅写农民不以滑稽和哀怜为目的，同样的，他写知识分子也不以感伤和顾影自怜为基点。发表于1919年4月的《孔乙己》以极为精粹的笔墨，塑造了一个迂腐、卑琐、穷愁落魄而又善良正直的旧式知识分子形象，揭露了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对他的毒害和摧残，可谓入木三分。吕纬甫（《在酒楼上》）和魏连殳（《孤独者》）则是属于新旧交替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曾经被辛亥革命推上时代的浪头，又被辛亥革命的失败淹没在水底；他们一度接受了新思想，有过反抗和叛逆，但终于又回到了自己曾经反对过的平庸生活中，向旧的习惯势力妥协投降。鲁迅在同情他们的坎坷遭遇和孤独反抗的同时，也指出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动摇性。更年轻的知识分子是接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涓生和子君（《伤逝》），他们在个性解放思潮的鼓励下，勇敢地冲出了封建家庭；但他们美好而天真的人生理想，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一次又一次地碰壁：失业、贫困、夫妻隔阂，彻底毁掉了他们的爱情。子君回到父亲家中，凄然死去；涓生仍然在孤独地寻找出路。这篇鲁迅小说中唯一涉及爱情的作品，它的意义显然远远超越了